抗战期间教会大学的西迁
——以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为例*

马　敏

抗日战争期间,全国有近10所教会大学像当时绝大多数国立高校一样,为了避免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相继由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迁移到西南大后方。在迁徙过程中,教会大学的师生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跋涉,风餐露宿,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写下了中国抗战史册上极为悲壮动人的一页。本文依据档案文献和回忆资料,以华中地区的两所教会大学——位于武昌的华中大学和位于长沙的湘雅医学院为例,具体论述其西迁过程,西迁后的教育事业,以及这种西迁的社会历史作用。

一、西迁前夕华中地区的基督教高等教育

抗战前夕,华中地区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在经历了1927—1928年的激烈震荡之后[1],通过向政府注册,逐渐走上了稳定发展的时期,各方面均呈现出令人鼓舞的进展。位于武昌的华中大学[2]于1929年重新复校后,随着美国雅礼会将其在长沙创办的雅礼大学并入,美国复初会将其在岳阳创办的湖滨学院并入,实力大增,遂成为华中地区首屈一指的联合教会大学,初步形成五个差会(美国圣公会、雅礼会、复初会、英国伦敦会、循道会)联合办学的格局。1935年至1937年,华中大学注册学生人数突破200人大关,师资力量也超过预期的指标。

位于长沙的湘雅医学院[3]于1929年复校后,招收预科生两班,学生共44名。1931年湘雅校董会和医学院分别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按照教育部规定,学制为六年,一年预科,五年本科。仪器设备和临床条件都具备一定的规模,教学和实习医院——湘雅医院虽仍属美国雅礼会所有,保持中美合作体制,但在很大程度上由学院管理和使用。湘雅的经费来源除湖南省政府拨款外,尚有教育部的补助费,以及美国雅礼会等不定期的捐款。尽管仍面临不少困难,但湘雅至少已成为当时华中地区最好的医学院,而且是最早开设医学预科的学校之一,吸引着许多外省和华侨学生。

然而30年代的中国就国内局势发展而言,却对教会大学的扩展极其不利。由于日本对东北的侵占及在华北不断制造事端,中国上空始终笼罩着不祥的阴云。1935年12月"华北事变"之后,北京数千学生高举反日标语,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全民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学生爱国运动也波及到华中地区,武汉、长沙两地的教会大学学生均参加了当地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华中大学的学生还响应武汉学生联合会的决议,于12月30、31日实行了总罢课,以唤起民众抵御日本入侵。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形势越来越严峻,华中地区基督教高等教育

* 收稿日期:1996-01-12

事业稳定发展的势头被打断了。华中大学因韦卓民校长于该年6月赴英、美开会讲学，校政改由黄溥代校长主持。年底，战争形势急转直下，12月13日，南京沦陷，威胁武汉，华中大学的西迁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呈递给校评议会的一个具体西迁方案是华中大学应尽快搬迁至湖南沅陵，在那里复初会有一所教会中学。但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黄溥代校长领导的评议会认为，立即搬迁是不明智的，华大还没到非搬迁不可的时候。事实证明，黄溥代校长等领导人的判断是正确的。1937年底华大照常举行了期末考试，而且，于1938年2月底又开始了新的一学期。

抗战爆发之初，湘雅医学院也坚持在长沙原址办学，成为当时少数几个能维持相对正常秩序的医学院之一。有一段时期，学院曾收容了60多名战区学校借读生。其教学医院（主要为湘雅医院）还为伤病员提供医疗服务。南京失守后，武汉告警，长沙亦人心惶惶，医学院面临应变的抉择。校董会与临危受命的张孝骞[4]代理院长共商对策后，初步决定西迁，以免医学院毁于敌手。但是，迁校却面临一系列困难。首先，参与创办并长期支持医学院的美国雅礼会力主不动，认为即使长沙沦陷，有美方的保护，学院和医院可保无虞[5]。其次，迁校经费和交通运输都难于筹措。而且，最重要且不易解决的问题是医学院究竟迁往何地。在争议和徬徨之中，1938年上半年，学院一边作迁校的准备，一边仍冒着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继续上课。

二、华大和湘雅的被迫西迁

1938年初夏，战事已逐渐逼近华中，随着日寇不断增加的狂轰滥炸，学校已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而一旦落入敌手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西迁已属势在必行。

华中大学的西迁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西迁由武昌迁往桂林；第二次西迁由桂林迁至云南喜洲。

华大首次西迁考虑了两个地方，一是湖南的沅陵，二是广西的桂林。经派卞彭博士和薛世和（P. V. Taylor）博士前往桂林实地考察后，校董会决定迁至桂林。主要因为在桂林可以得到当地浸礼会的帮助，租到较便宜的房屋，同时交通也相对方便。

1938年6月，华大西迁的准备工作在桂质廷博士的主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6]。6月底，仪器图书整理完毕，准备装船，师生们也收拾好自己的行装。7月3日，由体育系教师邵子博先生带领学生用整整一天的时间将行李、设备和书刊运至两条驳船上。次日晨，全校师生约100余人登上升火待发的小客轮，告别武昌，踏上漫漫征途。事实表明，华大西迁是非常及时的。尽管在以前的两个月中，武昌一直没有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但华大师生刚走后武昌就遭到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有几枚炸弹落到了华大校园附近。

华大首次西迁的路线，是先乘船由武昌至岳州，穿过洞庭湖经湘江至长沙，在长沙休整几天后，又逆湘江而上，驶向衡阳。抵达衡阳后，才发现桂林与衡阳之间的铁路要到9、10月份方能全线通车。因此只好决定人员先行，辎车则暂且留在衡阳，等通车后发往桂林。于是，大家又整装向桂林出发，先乘一段火车，然后改乘汽车，最后终于到达桂林，结束了华大西迁的第一阶段。

是年8月，韦卓民校长由美国飞越太平洋抵达香港。在香港稍事停留后便直接来到桂林，加入“流亡”中的华大。在韦校长等的领导下，华中大学很快就恢复了教学秩序，于9月下旬在桂林开学，这时它有130名学生，是广西的第一所教会大学。

10月，武汉失守，桂林成为敌机频频轰炸的目标。华中大学被迫改在夜间上课，但还是常常受到轰炸的干扰，无法正常教学。有一所男生宿舍因遭轰炸而燃烧起来，损失了一些衣物和

图书。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华大不得不考虑第二次西迁。

当时供华大选择的迁徙方向有三个：四川、云南和贵州。四川已有许多大学迁至那里，华中大学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地方。而贵阳当时极易遭到敌机的轰炸，也不是一个好的去处。比较起来，还是迁往云南比较理想，因云南似更易与海外取得联系，便于购买教学设备和书籍⑦。校董会提出的选择临时校址的条件有三条：一是远离大城市以避免日机轰炸；二是该地物价便宜；三是能与外界保持一定的通讯联系。根据这三条原则，韦卓民校长先行去昆明，在云南大族严氏家族的协助下，选定依山傍水的边陲小镇喜洲作为华大新的迁徙地。喜洲位于云南大理平原，在昆明以西 425 公里处，离缅甸线约 35 公里，气候宜人，四季温暖如春，被认定是华大"最好的落脚点"。

华大第二次西迁计划更为周密，首批人员于 1939 年 2 月 4 日出发，先乘汽车至中越边界的镇南关，然后乘火车经河内至昆明，在昆明略事休息后再乘汽车至喜洲。至于仪器、书籍和大件行李，则由薛世和博士和他的儿子爱德华及希金斯先生安排用卡车运输，他们走的路线是经柳州、贵阳至昆明，这是一条更长更难走的路线。至 5 月 7 日华中大学在喜洲正式开学，第二次西迁胜利完成。

华中大学的两次西迁，费时数月，行程八万里，奔波劳累，艰苦卓绝，在华大校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湘雅医学院的西迁也经历了两次，但首次于 1938 年 10 月自长沙迁往贵阳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第二次于 1944 年底自贵阳迁往重庆却是在日寇大兵压境之下的仓促之举。

由于当时缺乏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湘雅医学院最初仅考虑迁至省内某地。为此，张孝骞代院长曾专赴湘西沅陵考察。但发现该城居民不足一万人，原有的教会医院规模小，估计临床教学将成问题，只得予以放弃。省内既不行，只好退而思其次，考虑省外。太远的地方，如成都、昆明，限于经济条件，不敢设想。而邻省广西较近，且湘桂铁路正在铺轨，可能解决棘手的运输问题，成为湘雅搬迁的首选位置。经校方与广西省政府的接触，广西方面表示欢迎，并允给予援助。1938 年 7 月，湘雅医学院已将首批器材用船运至衡阳，伺机用火车运往广西。岂知广西方面忽然推翻前议，不同意湘雅迁桂，在进退维谷中，湘雅医学院只好临时决定迁往贵阳⑧。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称，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贵阳对湘雅又有其好处，第一，邻近湖南，来去方便，可兼顾长沙、沅陵和耒阳三个实习医院和沅陵护校。第二，贵州全省无铁路，山道崎岖，避兵灾最好。第三，贵阳在所有省会中是最小的，而与一般城市比又算较大的，当时已选定迁贵阳的机关学校不多。第四，南京中央医院已迁往贵阳，该院前此初迁长沙期间已和湘雅建立了关系，此时该院人员以外科医师为主，力量不够，湘雅内科临床医师恰好填补空缺；而一个组织完善、设备齐全的医院也能较满意地解决湘雅的临床教学问题。以上有利条件，使湘雅医学院西迁贵阳成为定局。

1938 年 10 月，湘雅医学院临时租得西南运输处的一批回空卡车，将 40 多吨重的器材、图书经广西运往贵阳。学生、教职工和家属则带随身行李乘 8 辆汽车经湘西赴贵阳。由于沿途公路质量很差，坡度大，急弯多，路面为碎石黄泥，晴雨都不好走，一路备尝颠簸之苦。

克服重重困难，湘雅于 10 月 11 日胜利完成迁往贵阳的任务，人员物资完好无损。经过两星期的紧张筹备，于 10 月 24 日上课，仅比正常开学时间推迟三周。

湘雅医学院在贵阳一直平安地呆到抗战末期。1944 年底战事再度紧张，敌骑深入广西，一度窜至独山，致贵阳震动。湘雅原可如中央医院一样，观望形势，必要时转入山区。但在人心浮

动的情况下，部分师生自行离院，难以制止，驻防防空部队乘机占据湘雅村校舍。医学院被逼如此，只得仓卒筹备迁重庆。由于形势紧张，时间迫促，图书设备顷刻装箱待运，损失不少。又时值严寒，师生员工和家属零散首途，有的竟步行数百里，狼狈凄惨之状，比之1938年有计划、有步骤地首次西迁，有天壤之别[9]。

三、西迁后的华大和湘雅

作为华中地区的两所主要教会大学，华大和湘雅虽然胜利完成了西迁，能够暂时远避战火的威胁，维持相对正常的教学活动，然而，如同其他内迁的高等院校一样，他们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和相对不发达的地区重新开始高等教育事业，其困难之大，是不难想象的。

云南喜洲以其银苍玉洱的美丽自然景观和淳朴的民风，为西迁的华中大学提供了一个静谧的新居，但它毕竟是一个闭塞的边陲小镇，同时也给华大师生带来许多生活上的不便和困难。总的来说，在喜洲流亡的最初几个月里，生活是相当艰难的。教职工及家属大多租用当地宗庙的厢房，也有租用院子的一部分，人畜杂处。刚开始时，普遍缺乏家具，饮食简单，燃料也仅能用木炭。春天来到后，疾病开始在师生中流行。由于当时喜洲医院里人手缺乏，医疗保健几乎谈不上，有几个教职工的孩子悲惨地死于疾病。当时唯一能看病的地方是12英里外的大理内地会所办的医院。加之与当地人语言不通，消息闭塞，与外界隔离的状况很严重，许多人都感到十分孤独和思乡。

较之于华大，湘雅医学院初迁贵阳时条件更为艰苦。刚到贵阳，湘雅师生和家属（包括一些小孩）借住在东城门外数里地“东山”上的一座庙宇里，老师和女同学住阁楼上，男同学住殿外楼下两厢。入夜躺下后，饥肠辘辘的老鼠在身上窜来窜去，成群的跳蚤迫不及待地发起“进攻”。后来迁入石洞坡“湘雅村”，但物质条件仍十分简陋，生活异常艰苦。住的房子只是几栋“干打垒”的二层木板房，低年级的同学则住在牛棚改成的宿舍里。长板凳一分为二，加上一腿，改成两个三脚凳，发给每个学生一条自管自用，听课、做实验、自修、吃饭和睡觉，都得随身携带。战乱使贵阳人口猛增，物资供不应求，物价飞涨，学生们带到贵阳交的一学期伙食费，两个月就吃光了。后来国民党政府发给的“贷金”，也只够每日三顿饭，每餐一个萝卜或白菜。老师们一样穷得一日三顿吃不饱，一位教授的孩子甚至因营养缺乏而得了夜盲症。

就是在上述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华大和湘雅师生以高昂的爱国热情，发扬基督的牺牲和献身精神，百折不挠，在贫瘠落后的西部扎下根来，徐图发展，一呆八年，坚守住“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文化前沿阵地”。

首先，最令华大和湘雅自豪的是，在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中，他们始终坚持了正常的教学，保证了较高的教学质量。对于华大的战时教学工作，韦卓民校长曾自豪地总结道：“计阅一年举校播迁者，长征八千里，而总计学生缺课不满六周，占全学年五分之一，员生坚（艰）苦至可钦佩也。”[10]湘雅亦如此。如前所述，第一次西迁到贵阳时，仅比正常开学时间推迟三周，学生注册人数较之前一年仅少6名。第二次仓促迁至重庆，虽迟至三月才开学，耽误了一些教学时间，但学校当即决定用缩短暑假的办法来补足1944—1945学年度丢失的学时。其认真负责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这两所院校学生学习积极性丝毫不减，均能刻苦向学。迁滇时期的华大“论读书的空气，这里并不亚于国内一般有名的大学，图书馆和各系的研究室，从早晨直至晚间都坐满了人。功课的紧张和考验的紧密，往往是新同学认为不是可以轻易应付的。成

绩很好的同学固然不感困难，然而稍差一点的同学，偶一不慎，功课即有重读的危险。"[11]华中大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和制度，如"重质不重量"、"中期考试"、"毕业总考试"等，在迁滇期间均得以坚持和发扬。"此旨趣，此精神，不惟保持至今而未坠，抑且历经患难而弥坚。"[12]

迁至贵阳的湘雅，也依然保持着求严、求实、求精的良好学风，使学生能受到严格的医学训练。每次上课前，教师都事先指定阅读教科书，有时一上课就先考预习的内容，促使学生主要依靠自己念书来获得知识。学校教学在重视理论的同时，更重视实际工作能力的训练，规定理论单科不及格可以补考，但实验或实习不及格，虽可升级，却必须全程补做实习或实验才准毕业。前五年的授课与实验，时间比为1∶3。做化学物理实验，就要求学生按英文学习指导上的操作步骤自己动手。学人体解剖时，每4人发给一具尸体，教师只教你如何涂凡士林，包裹尸体，防止组织干燥，其余的都要学生按实习指导操作。分析胃液时，要求学生自己吞胃管抽胃液，让大家体验病人的感受。到三年级，开设有尸体病理解剖，学校只要求同学自愿参加，但没有同学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尸体解剖常常是晚上进行，往往同学们一旦接到通知，不管刮风下雨天黑路滑即急忙赶去，并十分注意节约试剂和认真保管教学仪器。日本飞机轰炸时，一听到空袭警报，每个学生不论男女强弱，都本能地抱着自己的显微镜向四周山涧里奔跑疏散，从无怨言[13]。

良好的教学质量要靠优秀的师资队伍保证，西迁后的华大和湘雅均比较重视教师队伍的延揽和建设。初迁喜洲时，由于缺乏教学设备和研究条件，加之学生数量较少，与外界严重隔绝，华大师资流失比较严重，化学系连一名资深的教师都没有，生物系、物理系和经济系也不同程度地缺乏老师授课。为此，韦卓民等学校负责人多方联系，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有名望的教师任教。如楚辞专家游国恩教授、文选学专家包鹭宾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教授、社会学专家许烺光教授、教育学专家胡毅教授、分析化学家张资珙教授等。此外，一些知名的中国学者也经常应邀到华中大学讲学，如罗常培先生、老舍(舒舍予)先生、熊庆来先生和潘光旦先生等。美国知名学者费正清先生等，也曾来过喜洲讲学。除知名教授学者外，华中大学还重视聘请一些有成就、有抱负的青年教师如傅懋勣、肖之的、陈国杰、万绳武、许宗岳、阴法鲁、吴醒夫、应崇福、陈美觉、胡立彬等任教，使西迁后的华大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师资阵容[14]。

湘雅也十分注意罗致德才兼备的名师。从基础到临床，几乎每科都有一位或几位造诣较深的老师执教。如教有机化学的龙康侯教授，1949年后曾任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他离开后，张孝骞院长又从著名的黄海化学研究所聘请研究员谢祚永博士接替。余如朱鹤年、王承书、林绍文等老师均学识渊博，要求学生很严格。除聘请专任的名师以外，学校还尽可能邀请过往贵阳的名师前来短期讲授。如徐丰彦、柳安昌、沈霁春、卢于道、王季午、李振翩教授等均曾来湘雅讲过课。

正是因为教学质量堪称上乘，学生学习勤奋、刻苦，所以华大和湘雅在战时所培养的学生"其学力进展，并未尝稍弱于抗战未起之时"。而在个人道德修养和集体精神方面，似反较过去为佳。当时华大的毕业生一般均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尤其教育和经济专业的学生，社会需求更为迫切。其中一些优秀毕业生或考取著名的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或考取中央研究院的研究生，或被交通银行等机构、企业所录用。湘雅医学院则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医疗工作者和研究教学人员。

其次，除认真完成教学任务外，华大和湘雅还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活动，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如华中大学中文系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将研究方向转向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写出了一系列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深得哈佛—燕京学社的

好评[15]。他如物理系主任卞彭博士的"卞魏氏开关之新发明"及苍山十八溪水电动力的试验研究;生物系肖之的等师生对洱海各水层的氧含量 PH 值的研究,水生生物及浮游生物分布情况的调查;化学系卞松年等师生对滇西酒精、皮革、油脂工业的专题研究,以及瑶基族的抗疟素、衍生物的特殊研究,等等,都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为了加强学术气氛,华中大学师生还组织了各种学会,如生物、化学、无线电、历史、教育、国际关系、中文、外文等学会,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甚至在贵阳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湘雅医学院的科研工作也仍在进行。如朱鹤年教授为了继续他 1937 年的专题研究:怒叫中桓的定位,从国外首次引进了立体定位仪;齐镇垣教授研究使用乙状结肠窥镜诊断血吸虫病,以及证实伤寒病人白细胞减少的原因是白细胞分布不匀,分布在外周血的白细胞减少,在深部血中的增多;吴执中教授研究用骨粉作抗酸剂以减低胃酸的反跳现象,等等。到六年级,每位实习学员都要求写一篇论文,每位老师负责指导几位学员写作。论文可做病案分析,也可以做临床实验研究。

最后,西迁后的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仍继续保留着教会大学的传统,尊崇自建校以来所形成的基督精神价值追求。当时,湘雅医学院教徒学生比例较高,学生约一半以上为基督教徒。湘雅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拥有 90 名成员,它与贵阳市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女青年会密切联系,主办查经班和星期日礼拜[16]。而华中大学在 1943 年基督徒学生的比例为 32%,1945 年上升到 41.58%,但仍较抗战前为低。但因华中大学仍与最早的五个创设差会保持直接联系,受设在美国纽约的创设者董事会领导,因此,其基督教色彩较湘雅医学院更为浓厚。这与华大校长韦卓民始终强调教会大学的宗教特点,并直接聘请约占三分之一强的外籍基督徒教师大有关系。

西迁后,湘雅的常年经费主要靠湖南省津贴和教育部少数补助费,平均每年不足 8 万元(法币),学生所缴学费是微不足道的,仅约 8000 元,而来自雅礼会和其他教会机构的补贴几乎中断。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湘雅医学院董事会不得不于 1940 年宣布国立,更名为国立湘雅医学院[17]。反之,华中大学的经费来源仍主要由五个创办差会,尤其是美国圣公会提供,即使在抗战最困难的阶段也没有中断[18]。这样,就使华中大学看起来比湘雅医学院似乎"更像"一所真正的教会大学。

在喜洲时华中大学的宗教活动包括每周五次的晨祷,刚开始安排在早晨八点进行,后来学生觉得时间早了一点,于是推迟至每日上午和第二节课与第三节课之间进行。每周日的礼拜则在十点半开始。晨祷和礼拜通常由安德生先生领导的宗教委员会安排和组织。师生中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团契,除美国圣公会外,其他教派如英国圣公会(the Anglican Church)、Christ in China 也分别举办各自的宗教活动。这一时期华大的宗教活动之所以显得特别丰富多彩,除因战争环境中的患难使大家更加亲密无间,更加需要精神慰藉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广东协合神学院(the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曾一度(1939—1943 年)流亡到喜洲,并作为华大的协作学院,共用教学设施[19]。

综上可见,"流亡"中的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为了民族大义和抗战的胜利,凭借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精神所铸就的顽强的生命力,不仅在贫瘠落后的西南边陲扎下根来,而且排除艰难,徐图发展,为战时高等教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结论:西迁的意义与影响

抗战期间沦陷区 70 余所高等院校的被迫内迁西南[20],对我国尚属薄弱的高等教育来说,

不啻是一场大悲剧和大损失，是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累累罪恶之一。被迫西迁，不光使千千万万的高校师生颠沛流离、历尽磨难，而且使各高校蒙受了沉重的财产和学术损失，破坏了经多年积累的高等教育基础。

八年抗战，沦陷区各高校的财产和书籍损失是不计其数的。湘雅医学院虽运走了大部分仪器和书籍，但留下的校舍和设备几乎毁于一旦，当抗战胜利后湘雅返回长沙时，"看到的只是一座狼藉的废墟"，处处留存着残破的钢骨水泥架。华中大学西迁时，除遗留下全部房产外，还留下了三分之二的科学仪器，80%的书籍和全部家具桌椅。等抗战结束返回武昌后，发现校园财产损失严重，撤离时遗留在校园的图书家具均不知去向，窗户大部分损坏，地板也破坏严重，檐槽生锈，电线也被人割去，一片凄凉景象。据估计，华大在抗战中损失的书籍和设备共值208400美元[21]。

尽管西迁使华大和湘雅这样的教会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一样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然而，从积极意义看，西迁又是当日寇将战争强加于中国时，我国知识精英的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战略大转移，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勇气和毅力，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保存了血脉，其意义又是巨大的[22]。

西迁中所形成的那种团结一致、艰苦办学的精神气质，对各高校来讲，都是一笔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它融入各校的传统之中，成为其优良传统的一部分，代代相传，弦歌不辍。"艰难困苦，玉汝而成"。一所办得好的高等院校，关键要有一种精神，一种追求，能够培养她的学生具有高尚的人格。西迁的经历，无疑使先期形成的"华大精神"、"湘雅精神"中，又融入了一种团结奋斗的"抗战精神"，成为抗战复员后推动这些学校迅速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23]。

当然，应当说高等院校西迁最大的历史意义，还是在于其对开发西南落后地区所发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看，抗战期间大量机构和学校的内迁，对西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拓展和现代科学文明的传播，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内地高校的西迁实际上是一次高等教育机构的整体移植，使西南边陲之地的高等教育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一下子跃升了好几个台阶。华中大学所迁的滇西地区，别说高等教育就是中等教育也很不发达，因此，一所有质量的私立教会大学迁于此地，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华大又为滇西地区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教会大学通常有自己附属的中学，这些中学在抗战期间亦纷纷搬迁到西南。如由文华中学等五校组成的鄂湘教区联中先后搬迁到云南镇南和贵州清镇，雅礼中学和福湘女中都迁徙到湘西沅陵。这些中学与华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这些学校往往成为华大新生的来源地，而华大则成为这些学校的师资培养基地。此外，华大的教育学院也主要为当地培养中等师资人材。华大到喜洲后，首先就在师资上支援当地办的私立五台中学（现大理第二中学）。教育学院的学生到三、四年级，大部分要到这所中学任教实习，有的教师也到学校兼课，五台中学实际上成了华中大学教育学院的实习中学。八年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初、高中毕业生，对提高当地文化水平，培养人材，起了一定的作用。湘雅则系迁到贵州的唯一的一所医学院，对促进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

其次，教育的功能主要在于培养人才。华大和湘雅的西迁，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为西南边疆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知识人材。华中和湘雅西迁后，逐渐扩大了招收本地生源的比例，他们自身也在"西部化"。以1941年秋季为例，在华大注册的77名新生中，云南籍学生就占32名。自此以后，云南籍学生年年有增加，到1945年秋季，云南籍学生更高达174名，占整个在

校学生注册人数的68%以上[24]。另据统计，华大迁滇后，八年共招收云南学生300多人。这些同学毕业后许多都继续留在云南工作，成为云南知识界的骨干。仅以昆明为例，今日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林学院、民族学院、云南工学院、省中医学院等大专院校都有华中大学毕业或曾在华中大学读过书的校友。他们许多都已成为专家学者，被评为教授或担任过系主任等职务。还有些校友在科研单位任研究员，另有一批校友任教于昆明市和专州县的中学、中专及大专院校。

再次，高等教育机构所具有的科研优势，使他们在西南地区能够结合当地实际，开展有意义的科学研究，促进当地科学和学术水平的发展，并加深人们对开发西南边疆的了解和认识。

华大迁滇时期，以西南边疆（主要是云南）的自然和社会为其研究对象的成果多达数十种。中国文学系和历史社会学系师生主办的《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成为国内边疆文化研究的权威刊物之一。其中有关滇西南诏、白国、佛教、种族和各民族语言研究的文章，深受国内学术界和国外汉学家们的重视。在自然科学方面，生物系的肖之的教授率领生物系师生对苍山、雪山、洱海等地的动植物进行了广泛的采集和研究，写出了《洱海生物》、《滇西彩云》等研究论文，博得科学界好评。其《大理洱海水底生物研究》一文还获得过国家学术论文甲等奖。甚至在华大返回武昌后，肖之的教授仍然在继续进行滇西时期的研究，先后撰述了《滇西民家肺活量统计调查》、《滇西几种少数民族血液型之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这些学术和科研工作，不仅向人们展现了神迷的西部边疆生活，而且直接推动这一地区的开发和建设[25]。在贵阳，湘雅医学院不仅通过门诊为当地民众诊病，而且一些临床医师对某些贵阳地方病，如斑疹伤寒、疟疾、阿米巴痢疾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他如生物学、解剖学、细菌学、病理学等部门也联系当地实际分别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总之，抗战期间教会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西迁，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落后的西南地区得以传播和振兴，对缩小沿海大中城市和内地的文化差距，缩小东部发达地区和西南落后地区文明发达程度的差距，促进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均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同时，它又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更趋近于中国社会实际，使中国知识份子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有更深入的接触和了解，更能深切地体认到自己所肩负的为复兴中国、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培养人材的光荣历史使命，在这一意义上，西迁对我国战时和战后高等教育的定位与发展，亦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26]。

---

① 1927年因北伐和同时兴起的反帝运动，华中地区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如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等曾停办约两年时间。

② 华中大学系当时华中地区最早和最大的教会高等教育机构。其前身系由美国圣公会于1872年在武昌所创办的"文华书院"(Boone School)，1903年"文华书院"增设大学部，改名"文华大学(Boone Univeristy)，1924年"文华大学"与英国伦敦会创设的博学书院、英国循道会创设的博文书院合并组成"华中大学(Huachung College)。

③ 私立湘雅医学院成立于1914年，由美国雅礼会和湖南育群学会合办，并接受湖南省政府津贴。1925年，美国雅礼会的十年合约期满，撤销其对医学院的行政管理，学院完全交由中国人自办，并成立了新的董事会。

④ 张孝骞教授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届毕业生(1921)。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工作多年，1936年回校担任教务主任，1937年由校董会推举为代理院长，后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多年。

⑤ 事实证明雅礼会的想法是天真的，1944年长沙失守后，留在长沙的湘雅医院仓皇迁安化，损失惨重，护校则在长沙大火时解散。

⑥ 当时代理校长黄溥请求辞去校长职务，以把家人移至四川后出国享受休假年。学校决定在黄溥启程赴四川至韦卓民赶回这段时间，由孟良佐(A. A. Gilman)出任代校长，桂质廷博士负责迁校的准备工作。

⑦ 华大选择云南的原因，还有一点系当时在香港的云南所属大教区的主教霍尔(Rt. Rev. R. O. Hali)曾表示过，如果华大迁滇，他将对此行有所赞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华大决定搬迁去云南。

⑧⑨ 张孝骞：《湘雅医学院的缘起及其到抗战胜利的变迁》，见《湘雅春秋》，第26、29页。

⑩ 韦卓民：《华中大学史略》，见《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装订本)，藏《华大档》。

⑪ 《迁滇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概况》(华中大学编印，民国二十九年五月)，藏《华大档》。

⑫ 华中大学同学会，《呈母校并致各地校友一封公开的信》(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华大档》：34/48/77。

⑬ 孙其发：《湘雅医学院在贵阳》，见《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81、184页。

⑭ 范麟章：《抗日战争时期迁滇的武昌华中大学纪事》，见《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04—105页。

⑮ 如楚辞专家游国恩教授在喜洲时曾研究过白族"火把节"的起源等问题；文献学专家包鹭宾教授研究过云南土著民族的分类与分布，写过《白人非白族之后》等学术论文；语言学家傅懋勣教授研究过昆明倮倮族的方言等课题。

⑯ 《国立湘雅医学院——一份西迁贵阳后的历史性报告文档》，见《湘雅春秋》第41页。

⑰ 《湖南医学院前身——湘雅医学院大事记略》，见《湘雅春秋》第8页。湘雅医学院改国立后，校董会另组"湘雅医事中心"董事会，具体管理仍属私立的湘雅医学院与湘雅护士学校，与美国雅礼会发生联系，并协调湘雅三个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

⑱ 《华大档》中保存着大量韦卓民校长当时为经费问题与国外教会机构和办学组织的通信。

⑲ President's Reporot for the Two Years 1938—1940。

⑳ 抗战中全国战前设立的108所大专院校中，只有14所在敌占区勉强维持，77所从战区迁往西南大后方，共中包括国立的私立的和基督教会所办的各大专院校。

㉑ Huachung College, Estimated Losses in Wuchang by Francis Wei, Oct. 12, 1943. YDSLS。

㉒ 据统计，非敌占区91所大专院校1938年春季注册学生的总数占了战前108所院校注册总数的74%。1938年一年中，又有6所院校复校，使97所院校的注册总数达到了战前总数的95%。

㉓ 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在抗战结束后的1946—1949年的四年间校舍和办学规模均发展迅速。

㉔ 《1940—1945年学生各类情况统计表》，《华大档》，34/301。

㉕ 参见余子侠《华中大学西迁述论》，见《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㉖ 对教会大学而言，西迁还意味着自2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化"、"世俗化"过程的继续和深化。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教会大学不得不更多地从"天国"走向"人世"，在更广泛的社会服务的意义上，实现传播"福音"的使命。这种趋向从西迁时期非教徒学生比例的上升，教会大学师生对抗战政治活动的参与热情等表征，均可以看出。

责任编辑　沈继成